

DOI: 10.13317/j.cnki.jdsksb.2015.002

西方学术界的大跃进饥荒研究

[美]陈 意 新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明顿校区 历史系,北卡罗来纳州 威尔明顿 28403)

摘 要:西方学术界过去 30 年对大跃进饥荒的研究,以议题为线索,提出了一套观点及其观点形成的理由。首先,通过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调查资料的估算,学术界对饥荒中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 2 700 万~3 000 万有比较一致的认可;其次,社会科学家长期对饥荒成因的辩论不仅从方法上推动了研究的发展,而且让学术界认识到饥荒的发生有多重原因,包括高层决策失误、粮产下降、过度征购、食品分配中的城市偏好、强制的公共食堂制度等;第三,学术界深入探讨了饥荒死亡率的地区差异,大都认同一个省领导人的政治态度激进与否通常是影响该省死亡率高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有学者指出其他因素诸如农业自然条件的好坏等也是重要原因;第四,一些学者从村庄角度研究饥荒,试图理解影响农民生与死的微观机制,一致认同“吃青”(吃未成熟的庄稼)等传统生存手段对农民的存活有重要作用。学术界还探讨了其他课题,如饥荒的责任、饥荒中的妇女等。学者们长期的研究建立起了具有创意的学术对话,对理解大跃进饥荒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非正常死亡;过度征购;公共食堂;地区差异;政治激进主义;吃青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5)01-0013-13

本文讨论西方学术界对大跃进饥荒(以下简称大饥荒)的研究,以主要议题及其时间顺序为线索。这里的“西方学术界”是指在西方国家或西方学术体系里以英语发表著述的学术界。有的学者如德国人文浩(Felix Wemheuer)并非英语国家人,有的学者如荷兰人冯客(Frank Dikotter)长期任教于东方的中国香港地区,但他们关于大饥荒的研究却主要以英文在西方的学术体系里发表。有的研究者如贝克尔(Jasper Becker)是记者,但他的大饥荒著作对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还有许多学者是中国人,他们有的回到了中国,有的定居在西方,有的就职于中国香港地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在西方接受了学术训练,对大饥荒的研究成果都是用英文或首先用英文发表。

一、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西方学术界对大饥荒最早关注的是死亡人数。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学者们已经知道中

国在大跃进期间有过饥荒,当时西方报纸刊载了一些关于中国发生了连续三年灾荒的报道;1962 年大陆各地逃往香港地区的 10 万多的饥民有一半以上抵港,他们的经历为西方当时驻港的各类中国观察家们所了解^{[1]289-290}。然而,报纸上语焉不详的报道和饥民们的个人经历未能让学者对大饥荒有一个完整和可靠的判断。正如美国的阿什顿(Basil Ashton)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几乎没有公布过人口资料,对其人口趋势的推断只能靠新闻报道、经历者的叙述以及户籍登记中偶尔泄漏的一些片段,这种研究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2]。毫无疑问,死亡人数是判断和了解大饥荒规模的基础。中国长期对资料的保密使得西方学者难以得知大饥荒的真实状况,这反而让他们一直对大饥荒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很好奇。

1982—1983 年中国首次比较详细地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资料后,长期关注中国人口的西方人口学家立即成了第一批利用这些资料

收稿日期:2014-10-02

作者简介:陈意新,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 20 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的人,第一批研究大饥荒的学者。1982年10月中国发布了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公报,使得中国当时的人口数量有了一个坚实的数据;1983年7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了“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公报”,使得从生育率推算大饥荒期间人口有了一个可靠基础;随后在1983年10月于香港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中国首次公布了1949—1982年历年的人口,人口的性别构成,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所有这些数据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让人口学家以统计学方法重建1949年以来的中国人口,特别是谜一样的大跃进时期的人口。

首先对中国人口数据进行计算处理的人口学家中包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小组的科尔(Ansley Coale)。科尔对中国1949年以来的人口一直紧密关注,在1980年他就根据中国杂志诸如《经济科学》刊载的一些论文中使用的人口资料以及中国人口学家在北京的国际人口学圆桌会议上所提交的论文对大饥荒的人口进行了推断,认为1958—1961年中国的过度死亡人口是1650万^[3]。在新的人口资料于1982—1983年公布后,科尔利用了其中的生育率、婚姻率、死亡率数据对人口重新进行了估算。1984年科尔在代表人口与人口学学会向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提交的中国人口报告中提出,1958—1963年中国的过度死亡人口为2700万^{[4]70}。同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国际研究与国际项目中心主任班久蒂(Judith Banister)也利用了新公布资料对大饥荒期间的人口进行了估算。班的方法和采用的变量与科尔的差别不大,但由于她所修正的1960年和1961年的死亡率比科尔的要高,所以按照她所给出的死亡率,1958—1961年中国的人口过度死亡在2880万^[5]。

1984年所发表的论文中较被广泛引用的是阿什顿等的《中国的饥荒:1958—1961》一文,其作者包括一位经济学家、一位人口学家及世界银行的两位研究者。该文前半部分从人口学角度对大饥荒人口的各个变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后半部分则对大饥荒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该文认为科尔和班久蒂在使用1982年人口普查所获得的生育率和

按年度登记的死亡率这两个变量以重建1950—1982年中国人口趋势时有考虑不周的地方^①,因此对各种变量进行了重新修正,提高了儿童的死亡率。该文认为,1958—1962年中国人口的过度死亡量为2950万,其中成人为1730万,10岁以下儿童为1220万。或如作者在文章引言中简便声称的那样:1958—1962年中国过早死亡(premature deaths)人口为3000万,同期内因生育率降低而少出生的人口为3300万。至于大饥荒的原因,该文认为是由粮食短缺和政府的农业与粮食政策所造成。考虑到指出大饥荒的政策性成因会引起与中国打交道时的政治敏感,文章的第一作者为自己杜撰了一个“阿什顿”笔名以防真名泄漏^[2]。

人口学家之所以需要估算以及有着不同的估算是因为中国公布的人口数据有严重自相冲突的地方。在《中国统计年鉴—1983》里,中国的总人口数在1959年是67207万,1960年是66207万,1961年是65859万,连续两年下降,但在人口自然增长率栏里所公布的数据却是1960年为-4.57‰,1961年为3.78‰。显然,1960年的负千分比太小,1961年的千分比应为负增长^{[6]103-105}。在科尔、班久蒂、阿什顿等论文发表后,西方学术界对大饥荒人口的研究实际已告一段落。这些论文已考虑到了所有修正因素和算法,进一步的研究要靠中国未来的人口普查和生育率抽样调查的新资料。在人口学家看来,阿什顿等估算的1958—1962年有3000万人口非正常死亡是比较可以接受的说法,科尔和班久蒂的估算结果只是略低些而已。后来在1987年班久蒂也接受了大饥荒的过度死亡为3000万人的说法^{[7]85}。

1984年这批论文后,在英国读学位的中国人口学者彭希哲于1987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第一次以省级人口数据对大饥荒的人口影响进行了研究。彭希哲认为1958—1962年间中国过度人口死亡为2300万,但这只是基于14个省死亡率的推算,彭希哲自己也认为这一推算“非常粗糙”。彭的论文的贡献不在于估算大饥荒死亡人数,而在于展示了死亡发生的时段在各省非常不一样。例如,大多数省份过度死亡率最高的时候发

①例如文章指出,科尔在重建1950—1982年中国人口应有的“正常趋势”时没有考虑到大饥荒期间大幅度下降的生育率实际上会导致死亡人数的降低。参见 Basil Ashton, Kenneth Hill, Alan Piazza and Robin Zeitz “Famine in China, 1958—19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0, No. 4(1984): 613—645.

生在 1960 年,而在吉林、黑龙江和广西,过度死亡率最高的时候发生在 1959 年;当 1962 年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死亡率大致已降到了正常年份的水平,高死亡率危机却依然在吉林、上海、山东、广西和四川持续^[8]。学者们显然需要解释这些差异背后的意义。彭希哲从各省粮食供应的角度对死亡率差异作了一些解释,但未能说明粮食供应的紧张在各省为什么会有时段的不同,不过,彭希哲的论文展示了一个从省级水平来理解大饥荒的新方向。

尽管人口学家可以利用人口普查和生育率抽样资料来估算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但普查和抽样所得到的毕竟是回顾性的数据,人口学家仍需用实际记录的死亡率来配合估算和修正。由于大饥荒期间对死亡人口有着漏报、多报和少报,记录的死亡量或死亡率并不总是准确的,这样就为其他诠释留下了空间。1996 年贝克尔引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陈一谔的说法,指出大饥荒的死亡人口为 4 300 万~4 600 万;陈一谔是在改革年代初期在各省看到内部档案后作出这一判断的^{[1]272}。2005 年中国人口史学家曹树基通过对全国各县县志中记录的人口计算,认为 1958—1962 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3 246 万(不包括京津沪以及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9]281}。2008 年记者杨继绳在其名著《墓碑》中通过对《中国人口》丛中各省人口的计算以及参考公安部人口统计部门王维志的看法,认为 1959—1961 年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为 3 600 万^{[10]904}。这些依靠记录得到的大饥荒人口死亡数通常比人口学家估算的要大,并为后来一些西方学者对死亡人口的判断提供了基础。例如香港大学的历史学家冯客在 2010 年认为,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至少为 4 500 万。冯客没有对人口进行系统计算,而是以曹树基的著作为基础,然后利用在国内看到的一些档案举证来说明在许多县死亡的人口比县志记载的数量要大,即比曹树基认为的数据要大。基于这些差异,冯客估出了 4 500 万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冯客还指出,国内对大饥荒有着研究的独立学者余习广认为过度

死亡人数为 5 500 万^{[11]329-334}。

记录的人口死亡无论数目多么大都须面对人口普查数据的挑战。大饥荒期间的人口登记不准是个已知事实,1982 年的人口普查准确率很高亦广为学者所知。关键在于 1982 年的普查给出了一个人口年龄与性别的金字塔(见下页图 1),确切展示了 1958—1962 年间出生人口的凹陷。如果要准确理解中国人口曾有过的变动,这一凹陷需要合理地填补起来。它的填补需要精确计算生育率,包括年度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估算育龄妇女人口、全国总人口及总人口中过度缺失的人口、死亡率等。大饥荒时期的过度死亡人口无论被记录或被估算得太多或太少都会与 1982 年人口金字塔的凹陷处对应不起来。鉴于记录的大饥荒死亡人口数近年来在学者中有越走越高的趋势,与 1982 年人口普查结果相去越来越远,美国人口学家蔡永和澳洲人口学家赵忠伟在 2010 年和 2013 年各自重新研究了大饥荒的过度死亡人口。他们主要利用了 1982 年 1‰ 和 1988 年 2‰ 生育率抽样调查。蔡永把大饥荒期间每月出生的婴儿数与每月存活者的队列进行了细致的比较,赵忠伟对 6 个省大饥荒期间的婚姻率、生育率和死亡率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两人在对多种变量进行很细致的计算后所达到的结论是相似的:蔡永认为 1958—1962 年的过度死亡人口约为 2 700 万;赵忠伟没有具体提出全国死亡人口数,只是指出他估算出的 6 个省死亡率与彭希哲的一致,但鉴于他估算的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从 1958 年就比较高,按他的数据所能推算的大饥荒人口死亡数在 2 600 万~2 700 万^①。

西方人口学家经过 30 年努力所能断言的是中国在大饥荒中大约有 2 700 万人非正常死亡,如果把对死亡率的估算在允许的范围内上升到顶,那么死亡人口近 3 000 万。中国的文献资料或内部档案可以让其他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让冯客在曹树基数据的基础上再加上 1 250 万死亡人口,说明大饥荒期间的人口死亡记录是比较混乱的。

①Yong Cai. "Excess Mortality during the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 Revisit."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Famin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Great Leap Famines and Famin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June 8—12, 2010; Zhongwei Zhao and Anna Reimondos. "The Demography of China's 1958—1961 Famine: A closer examination." *Population*, Vol. 67, No. 2, (2012):281—3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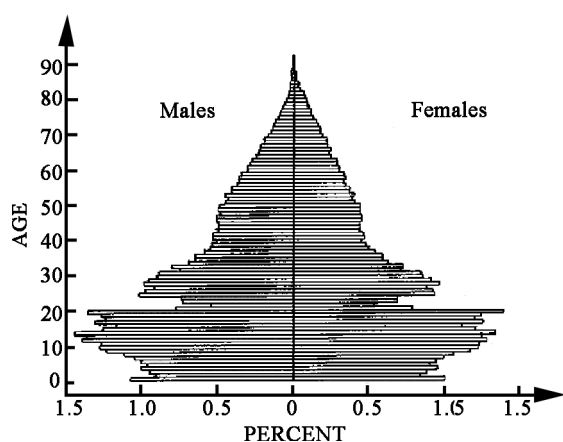


图1 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的中国人口金字塔

资料来源: Ansley Coale. "Population Trends, Population Polic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in China."

二、大饥荒的成因

随着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983—1984年变得比较清楚后,西方学术界对大饥荒关注的下一个问题是其成因。最先对成因探讨的是一批社会科学家,其中第一位是美国政治学家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伯恩斯坦依据《中国农业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粮食资料,研究了大跃进期间的粮食征购,在1984年发表了论文,认为过度征购是大饥荒的成因。伯恩斯坦指出,在1959—1960年间,全国粮食产量连续下降,但国家的粮食征购量反而上升了20%或更多,其中1959年上升了28%,其结果是大幅度降低了农民的口粮,导致了饥荒,因此大饥荒主要是人为的灾难^[12]。其实前述阿什顿和彭希哲都对饥荒成因作了探讨,他们对粮产、征购和口粮的计算比伯恩斯坦更详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没有对粮食政策及其相关的其他因素如城市化、天灾、外贸等进行细致分析,而伯恩斯坦则论及了这些因素,分析和解释了为什么要大幅度提高征购。伯恩斯坦认为大跃进的粮食产量浮夸、大批农民进城工作(因而减少了农村用粮)和中央政府自行对“余粮”的定义是大幅提高征购的原因。在1932—1933年苏联的大饥荒中,斯大林和苏共领袖不信任农民,当时的高征购包含着对农民的惩罚,那场大饥荒是对农民“有意极度剥削”的结果。在中国,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只是要利用农民,没有要惩罚农民,但他们相信了浮夸的产量,实行高征购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因此中国的大饥荒是领导人对大跃进“经营不善”(mismanagement)的结果,毛泽东

和他的同事们是有责任的^[12]。

自伯恩斯坦文章后,西方学术界的大饥荒成因研究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探讨中共中央的政治斗争和大跃进决策的制定,另一是探讨饥饉和死亡的形成。在前一个方向上做研究的主要是政治学家。虽然他们都指出是大跃进导致了大饥荒,但他们的论著都关注大跃进的起源而非大饥荒的起源。在这一群研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三本书。一本是美国政治学家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文革起源2:大跃进,1958—1960》(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该书出版在伯恩斯坦的论文之前,不过不是一本研究型著作。马若德详述了大跃进政策制定的过程,但没有就大跃进或大饥荒提出论点,读者从其叙述中或许可以理解到中央领导人之间的政治斗争是大跃进政策的起源。另一本是美国政治学家巴赫曼(David Bachman)1991年出版的《官僚、经济和中国的领袖:大跃进的机构化起源》,该书认为大跃进运动是许多中央机构作用力的结果。当时中央部委比较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协调中心,例如商业部、财政部、农业部和轻工业部就都主张增加农业投资,利用市场,限制计划经济和重工业;而计委部门、冶金部以及各个机械工业部则有着利益互补,形成了另一个协调中心,支持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的苏联经济模式。在面对各个部委的单独或合成利益时,毛泽东的权力受到了许多限制^{[13]220,237-241}。还有一本是澳洲政治学家泰伟斯(Frederick Teiwes)与孙万国(Warren Sun)合著、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通向灾难之路:毛、中央政治家、省级领导和大跃进的展开》。该书认为大跃进是毛泽东主导的进程,毛泽东的同事们最多只能试图影响毛泽东的政策偏好,绝非限制或挑战毛泽东的权力;而毛泽东任性地不断改变政策使得整个制度瘫痪,导致了大饥荒。泰伟斯和孙万国认为,巴赫曼从机构化的角度去理解大跃进的起源并强调毛泽东的权力受到限制是属于“执迷不悟”(wrong-headed)^{[14]xii,182-188}。

上述三本著作因内容丰富故而在中国资料保密的年代是很重要的,但在1990—2000年代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大量中共领导人物的传记、文稿、年谱以及中共中央的文件选编后,大饥荒在中央的主要成因已经比较清楚,不再需要很多学术讨论。例如在中央文献研究所的《毛泽东传(1949—1976)》于2003年年底面世后,伯恩斯坦

很快就根据该传记中比较准确的关于毛泽东的活动的记述而修改了自己关于大饥荒的看法,不再认为饥荒是由于“经营不善”。伯恩斯坦在其新论文中认为,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已经知道农民为大跃进付出了惨痛代价,但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冲突导致了毛泽东决定在更极端的环境下持续大跃进,有意无视了从大跃进前期学到的教训,放弃了自己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责,听任了大饥荒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因此毛泽东对灾难有着直接的责任^[15]。其实伯恩斯坦对毛泽东和大饥荒的新观点并没有超出《毛传》的见解。中央文献研究所的《毛传》对大饥荒的责任当然不会说得这么直接,但却明白无误:庐山会议是“毛泽东又一个失足的地方”,会议后,“‘左’倾错误路线重新泛滥,一个严重经济困难局面出现”^{[16]1010}。

在另一个研究方向上,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则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这个方向上首先做出研究的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的经济学家林毅夫(Justin Lin)。1990年,已任教于北京大学的林毅夫在西方杂志上发表了关于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论文,运用了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的“应有权利”(entitlement)概念和社会科学里流行的博弈论,对大饥荒的起因作出了诠释。林毅夫认为大饥荒灾难的根本性原因是农民在强制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失去了应有的“退出权”,而坏天气、坏政策和经营不善只是次要的原因。林毅夫指出,集体化强迫农民加入人民公社,取消了农民在合作社时期享有的退社权,使农民们只有一次性博弈,即入社,失去了多次性博弈的机会,即反复入社退社,其结果是一个社员无法运用退社的机会来防范其他社员的偷懒,随之便是整个劳动激励机制失效,劳动率大幅度下降,粮食产量也相应大幅度下降,以致粮食供应出现了短缺,造成了3000万人口的死亡。林毅夫也考虑到了1962年以后农民仍无退社权但大饥荒却未再度发生的事实,指出1959—1961年的农业生产是突然滑坡,由1958年秋农民被剥夺退社权所引起;1962年以后农民适应了生产队的低激励和低效率,虽不再有大饥荒,但直至1978年农业的生产率比1952年前的单干时要低,比1952—1958年合作社时期农民拥有退社权时也要低^[17]。

林毅夫的观点很快受到了不同看法的挑战。1996年美国政治学家杨大利在其关于大跃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认为,大饥荒在实际生活中的

关键成因是人民公社下的公共食堂制度。杨大利认为林毅夫系统地研究了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但那主要是关于劳动率的变化,而非大饥荒的成因。杨大利指出,在1958年秋全国农村建立了公共食堂后,受到中央领导人的鼓励和乌托邦集体主义生活的影响,食堂对社员免费供应膳食。吃饭不要钱让农民在食堂里敞开了吃而没有管理的纪律。在一些公社,食堂3个月的粮食在2个星期里就被吃完。由于每个公社的粮食供应是有限的,免费膳食迅速导致了存粮的短缺和随后的饥馑、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下降,农民开始饿死。杨大利的大饥荒成因说法可谓是“过度消费论”:过度消费导致了粮食短缺,短缺造成了饥荒。假如没有食堂制度,这种过度消费和饥荒不会发生。所以在食堂办起来之后,1959年春至少已有10个省有了饥荒,并且后来可以看到:哪个地方有越多的人在食堂吃饭,那个地方的死亡率就越高^{[18]54-56}。

1997年美国经济学家张欣(Gene Chang)和文贯中(G. James Wen)也提出了与林毅夫不同的看法。张欣和文贯中承认许多因素对大饥荒的发生起到了作用,但起到主要作用的是公共食堂制度。张欣和文贯中与杨大利的说法不一样,并不觉得过度消费起了重要作用,而认为关键是食堂制度剥夺了农民的粮食产权。张欣和文贯中指出,中国人均占有粮在1958年为299公斤,1959年由于粮食出口大增而降到了247公斤,但仍比饥荒结束后的1962年还要高出3公斤;从1958至1959年4月,中国的粮食征购只相当于1953—1955年的水平。换言之饥荒不应出现在1958至1959年上半年,因为从人均占有粮和征购数量来看,粮食短缺和过度征购都尚未发生,可饿死人恰恰已在1958至1959年上半年成规模地出现。张欣和文贯中认为,造成饿死人的是食堂制度。从1958年秋开始农民不许有自家的厨房和存粮,无法再做到家庭里有计划地精细用粮;在食堂里粮食不仅被过度消费,而且还由于缺乏管理纪律遭到浪费;此外农民还要忍受食堂领导人的腐败和滥权。张欣和文贯中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民的人均占有粮只是在生存水平,当他们一旦失去粮食产权,不再有吃粮的补救手段,在食堂里无法吃饱并遭到口粮的克扣或剥夺时,饿死人的事件就无可避免地发生。到了1959年春天后,饥饿和体弱导致了劳动能力与粮食生产的下降,再加上国家的过度征购,饥荒大规模地发生。所以1959年

春季之前与之后的饥荒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故事:之前的饥荒没有过度征购却有食堂,之后的饥荒既有过度征购又有食堂,并且还是之前饥荒的后果,所以,诱发饥荒并使之持续的是食堂制度^[19]。

不同的观点导致以上学者在1998年举行了一场辩论。在辩论中,林毅夫与美国经济学家杨涛(Dennis Yang)合作,坚持“退出权”是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根本性原因的看法。至于大饥荒,林毅夫和杨涛经过计算认为粮产下降所导致的粮食短缺和国家粮食分配制度中对城市的偏好是造成农村高死亡率的两个主要成因。林毅夫和杨涛对食堂制度成因论进行了反驳,认为食堂在1958年8月才开办,在大部分地方是1958年10—11月才建立,而1958年是丰年,秋收的时间也是10—11月,新开办的食堂没有可能在一两个月内就吃完了秋季丰收的粮食。林毅夫和杨涛还指出,那些被用来支持食堂制度成因论的数据也不够准确^[20]。对于林毅夫一方的批评,杨大利和美国政治学家苏福兵搜集了更多的数据并指出,1959年底在食堂吃饭的人数最多,紧接着在1960年初饿死人也最多,而其他时候在食堂吃饭的人数相对少,死亡率也相对低,所以他们还是坚持杨大利早先的看法,食堂是关键的制度性因素,食堂里的过度消费导致了粮食短缺和饥荒^[21]。张欣和文贯中依然使用他们的排除法,利用了更多的粮食资料进行了计算,指出1962和1963年农村的人均口粮都是165公斤,没有饿死人,而1958和1959年中国的人均占有粮比这要分别高出20%和13%却饿死了人。所以粮食实际上没有短缺,饿死人的原因在粮食之外,在于食堂制度^[22]。

林毅夫的《1959—1961年农业危机》一文其实是他的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部分,在于论证农业集体化的错误以表明后来家庭生产责任制及其劳动激励机制的正确。这篇文章不仅在1990—1993年间引起了一场关于退出权、激励机制和生产责任制的辩论,并更久远地引起了关于大饥荒成因的辩论^[20]。鉴于大饥荒成因问题仍未解决,林毅夫与杨涛合作在2000年首次用计量经济学对粮食分配和粮食的生产与供应的数据进行处理,以数学方法计算出粮食分配的城市偏好和粮产下降后的粮食短缺是大饥荒的成因^[23]。2003年林

毅夫与香港科技大学的经济学家龚启圣(James Kung)合作再度探讨了大饥荒的成因。龚启圣和林毅夫建立了多重因素框架,用回归算法观察了21个省的数据,对林毅夫以前的理论有了些修正。龚启圣和林毅夫认为,大饥荒的过度死亡是由多重因素导致的,包括粮食供应量的下降、对农民歧视性的过度征购、国家对劳动力过度动员和对死亡的忽视等。龚启圣和林毅夫还指出,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多地把政治因素考虑进去。但无论如何,他们算出的结果不支持食堂制度成因论^[24]。在龚启圣和林毅夫之后,美国经济学家李伟和杨涛用计量动态模型计算和解剖了中央计划经济的错误,认为1958—1961年间粮食生产下降的原因可以33.0%归于国家把资源从农业调离,28.3%归于过度征购,12.9%归于坏天气^[25]。2008年,杨涛更指出中央计划经济的系统性错误是大跃进期间粮产下降的根本原因,而粮产下降导致的粮食短缺和粮食分配的城市偏好则是大饥荒的两个中心成因。杨涛指出,用偏相关系数方法对省际死亡率差异进行计算,30.5%的死亡可被归因于粮食供应短缺,69.5%可被归因于粮食分配的城市偏好^[26]。

从伯恩斯坦1984年的文章始,社会科学家们为大饥荒成因辩论了30年。这些辩论虽然还未达成一致的意见,但从起初的寻求单一成因到后来的解释多重成因,辩论已让学术界认识到大饥荒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重的。这些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使用计量方法来探讨大饥荒的成因,对大饥荒研究的发展很有推动。从早年对数据的阅读和估算到2000年以后使用回归计算和动态模型,经济学家们把大跃进期间粮食生产失败原因的相关性系数精确到了小数点,也把大饥荒成因的相关性系数精确到了小数点。这些计量方法的使用还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年轻一代经济学家对大饥荒成因的研究和辩论^①。

但这些看起来非常精确和科学化的计量方法对大饥荒研究的适用性是有限的。这些社会科学家所关心的其实是大饥荒中能被观测出来的经济理性、政治理性、人口理性,而不是作为一个事件的大饥荒本身。例如李伟和杨涛在使用动态模型研究1958—1961年中央计划经济时就指出,他们寻求的是将中国政府的行为理性化^[25]。然而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中国的经济行为表现为

①参见:刘愿《“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载于《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3期,第1119—1142页;范子英《关于大饥荒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于《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3期,第1151—1162页;刘愿《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辨:政治权利的视角》,载于《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3期,第1177—1188页。

没有理性:没有什么计量模型可以精确表达毛泽东 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思维的突然转变,或表达中央政府为什么要等到 1960 年 10 月以后才开始在全国救灾^[16]1099—1105。这两个事件是认识大饥荒的形成和高死亡率的关键。计量方法也难以解释为什么在同样的计划经济下全国各省在饥荒死亡率上有着巨大差异,这或许是龚后圣和林毅夫指出要更多地考虑政治因素的原因,因为各省领导人对政策贯彻的力度不一可能导致省际的差别。重要的是这些计量方法得出的结论解释不了饥荒中的实际死亡。安徽在 1959—1960 年死亡率极高,但在 1961 年 1 月底省委决定救灾而发放定量的粮食、黄豆和红糖后,饿死人现象基本停止^[27]233—234。所以,安徽省的粮库在 1959—1960 年是有些粮食的,农民在此期间大量非正常死亡不是因为粮食短缺“没有得吃”,而是因为政策制度“没有让吃”。进一步深入农村生活里去看,大饥荒时大多数村庄都是一部分村民死去,另一部分活下来。当大家都在村里吃食堂,而死亡和生存却有了分野,“没有让吃”或许更说明那些死亡的人为什么会死去,这种情形可能不是计量曲线所能表达的。实际上,靠着假设、数据、模型和修正偏差所得出的看似精确的关于大饥荒的计量结论在社会科学家们自己之间也无法获得一致的认可。大家都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可代入自己的模型后却算出来不一样的大饥荒成因,并且说来说去的就是产量下降、粮食短缺、城市偏好、食堂制度。甚至有些遗憾的是,或许是由于专业的要求,以计量方法对大饥荒进行研究的论文似乎越来越追求算法和模型的复杂、兼容、完美,越来越少地从历史生活实际中去理解饥荒和死亡的成因。

三、大饥荒地区差异及成因

大饥荒的省际死亡率差异是计量模型难以解释的,这是因为差异的原因复杂,难以数据化。例如按官方统计,1959—1962 年安徽死亡率增长是山西死亡率增长的 26 倍;以 1956—1958 年平均死亡率为基数,安徽在 1959—1962 年间增长了 474.86%,山西增长了 18.33%。其他所有省份则排序在安徽和山西之间^[18]57。从数据看,似乎是有些省份很缺粮,有些省份不缺粮,但也正如前述及,复杂之处在于看上去最为缺粮的安徽省的粮库即便在最困难的 1959—1960 年也还是有些粮食的。所以看起来缺粮的未必就是真的缺到了无法救荒的地步,省际死亡率差异的原因不是靠粮食宏观数据所能算出来。但省际差异需要有解释,否则大饥荒的成因无法获得恰当的理解。

杨大利最早对省际差异提出了系统的看法。在杨大利之前彭希哲已指出了省际死亡率差异,特别是死亡率高峰的时间差异,但彭希哲没有作

深入解释。杨大利在 1996 年提出了“政治激进主义”,认为大饥荒的死亡率与一个省人口的公共食堂参与率、人口中的党员比例、省领导人的政治意识形态相关。在杨大利看来,食堂制度是理解死亡的关键,即过度消费导致粮食短缺和死亡。但在一个省里,党员的百分比低则说明非党员干部相对地多,意味着这些干部会更热忱地执行激进政策来证明自己的政治忠诚以获得党员资格,他们当然会大办食堂。而如果省领导的意识形态越激进,那么该省在推进大跃进政策时就可能越积极,农村里办的食堂就会更多,在食堂里吃饭的人也就更多,即食堂参与率高,其结果是死亡率也高。杨大利指出,安徽、河南、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的食堂参与率都超过了 90%,这几省的党员率都很低或比较低,省领导人都是激进人物,它们的大饥荒死亡率都很高或比较高^[18]56—59。不过杨大利的著作主要研究的是 1978 年以后农村改革的起源,对大饥荒本身除了诠释一些数据外没有做仔细研究。杨大利想解说农村改革首先出现在安徽和四川等地并非偶然,大饥荒中受害最严重地方的农民最倾向于改变他们的境况。

杨大利的政治激进主义引起了一些关于论据方面的批评。例如林毅夫和杨涛认为,党员率低不说明什么,党员率高的地方可能政治上更热忱,因为党员干部更可以靠执行激进政策获得自己的提升^[23]。美国历史学家陈意新也指出,食堂参与率也不很说明问题,因为杨大利使用的食堂参与率数据是中央政府在 1959 年 12 月取得的,那些参与率低于 50% 的省份都是些很冷的地方或牧区,例如杨大利指出的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青海、甘肃和山东。很难指望这些省的农民冬季里每日三餐在冰天雪地里跋涉一两里路去食堂吃饭,或每顿饭骑马十几里去食堂^[28]。不过林毅夫和陈意新等都认同杨大利的政治激进主义看法,认为它是理解省际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2011 年陈意新在其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比较了大饥荒期间安徽和江西的不同,指出政治激进主义虽是省际差异的一个因素,其他因素也同样重要。陈意新以曹树基的人口数据指出,在 1958—1962 年间安徽的总死亡率比相邻的江西高出了 17.33 倍,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是三个原因。一是江西的自然条件比安徽好:江西的面积比安徽大,人口只有安徽的一半,农业自然条件也要好得多,在饥荒时江西农民有远比安徽农民好的抗荒条件。再一原因是国家 1958 年规定的农业税法让江西政府可以控制很多粮食。农业税规定新开垦的土地免税三年,而江西从 1958 年初就建立了大量的农场垦荒。这些省办农场至 1959 年底已生产出相当于江西粮食总产 1/7 的粮食,由于不用缴农业实物税,江西政府可以用这些垦荒产出的粮食赈荒。安徽既无荒地可开垦,更无充裕的粮食可控制。还有一个原因是省领导人的

政治态度。江西的几位省领导都是红军出身的本省人,有的在游击战争中受到过本省农民的保护,对本省乡土和农民感情深厚,对在农村推进激进的大跃进运动并不热忱,饥荒出现后则愿意采取救荒措施。安徽的主要领导人不是本省人,与本省地方的联系不深,不仅政治激进,并且在推行中央的大跃进极端政策时非常无情^[28]。陈文显然认为理解大饥荒的省际差异需要考虑多个因素,要审视省与省之间一些关键性的具体不同。

不过社会科学家们在理解大饥荒时仍使用自己的数据解读方法,与历史学家的史实解读方法不一样。2011年龚后圣与其博士研究生陈硕合作,发表了一项新的关于省级政治的研究,拓展了学术界对政治激进主义的思考。龚后圣和陈硕使用了大跃进时期各省领导人包括第一书记和省长共81人的资料,以粮食过度征购量为相关性的衡量基数,考虑了死亡率等其他数据,得出结论认为造成一个省领导人政治激进的原因主要是其职位等级(rank),而非其意识形态或个人性格。龚后圣和陈硕把省级领导人作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非委员的区分,经回归计算后得到的结果为:在候补中央委员为领导人的省份里过度征购量要比中央委员为领导人的省份里高出3%,这相当于增长了1.11%的死亡率;如果以大跃进期间6.59%的过度死亡率为基点,那么这1.11%的增长可以被转化为16.83%的过度死亡率,即职位等级因素与16.83%的过度死亡率有相关性,一个很大的数字。因此龚后圣和陈硕认为在理解大饥荒的政治激进时,不是要看省领导人是谁,而是要看其职位等级,是什么样的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之所以最为激进是因为他们有“职位激励”(career incentives):可以被提升为中央委员,享有与职位相应的更大的特权、地位、权力。中央委员没有如此激进是因为他们的职位激励小:他们已在权贵阶层中,而升入政治局则有“入门障碍”,主要是革命的资历。非委员升入中央委员也会面临相同的入门障碍,所以他们的职位激励也小,也不像候补委员那么激进^[29]。

省际差异的研究不是没有问题的,即便精细如龚后圣和陈硕的研究。一个省领导人的政治激进,无论是由于其思想意识或职位等级,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其治下的县与县之间在大饥荒时差异巨大。如果一个省领导人因激进而导致了该省大饥荒严重,那么其治下的各县的严重性应该是相似的,可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如果县际之间的差异不能用县领导是否是地市委委员或候补委员这样的一套数据来解释,找出他们的“职位激励”,那么龚后圣和陈硕“职位激励”的理性在解释省际差异上未必就说得通。在英国经济学家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看来,大饥荒中县际之间的差异是“随机”(random)的,无规律可循。布拉莫尔利用县志的数据,对大饥荒期间的四川地图作了84个县的研究,观察了它们的粮食和天气数据,特别是仔

细观察了它们是否有可以归类的死亡率形态。布拉莫尔在2011年底发表的论文结论是:四川分县的死亡率明显缺乏形态,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算出的死亡率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系数不具有统计学的重要性。布拉莫尔认为,这种“随机”的差异只能用地方干部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反应不同去解释,从较次要方面看,气候的好坏也对粮食的生产与供应起到了一些影响^[30]。不过布拉莫尔没有研究地方干部,没有解释他们的反应为什么会不同。

在布拉莫尔很有意义地把大饥荒地区差异的理解从省级引向县级时,澳洲历史学家高安东(Anthony Garnaut)却试图从超越省级的大区来理解差异。作为有数学训练的历史学家,高安东把中国划分为7个经济协作大区,如华东、华北等,计算了全国的粮食征购、粮食分配、交通运输等数据,从地图上观察7大区的粮食供应、饥荒和死亡率。高安东认为,城市偏好是饥荒的根本原因,它导致了中央对粮食的过度征购。但中央按经济协作大区把全国划分为“余粮区”和“缺粮区”的做法却是导致政治激进主义和饥荒之地区差异的主要条件,或者说经济地理是主要条件。中央对“余粮区”和“缺粮区”的征购有不同要求,通常设立了粮食调拨指标,要求余粮区通过铁路向其他地方,特别是向城市调拨。中央的指标鼓励了地方各层干部为实现调拨而变得政治激进,而他们对政策贯彻力度的不一则导致了地方死亡率的差异。因此政治激进的根源在中央,河南信阳事件中那些被惩罚的地县和乡村干部不过是在完成中央的指标而已。当中央不再激进,在1962—1964年下发了15%的城市人口,并从北美和澳洲进口粮食后,城市粮食供应的压力已去,调拨指标不再向地方形成政治激进的压力^[31]。

地区差异的研究无疑加深了学术界对大饥荒的理解,研究的观察点也从省级被向下拓展到了县级和向上到了大区。这些研究比较一致的地方是确认地区领导人的政治激进态度是导致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但对于激进态度的形成却有不同的看法。尽管陈意新认为理解地区差异要考虑每一地区的多个具体因素,但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式还是以数据来理性化政治激进的原因。这种诠释含着两个问题。一是到底怎样认识地区领导人的政治激进。杨大利的说法可谓主动激进,即激进是因为意识形态;高安东的说法可谓被动激进,即激进是因为必须要贯彻上级的指标;龚后圣和陈硕的说法是刺激激进,即激进是因为外部的激励机制。这些说法可能都有道理,但都相对局限在了大饥荒一个时段。认识地区领导人的激进可能需要从更长的历史时期去观察。只有以上这些说法能同样适用于诠释反右运动、文革起源或批林批孔运动等,大饥荒中的政治激进成因才可能被合适地理性化。另一个问题是从哪一级层面可以说清楚地区差异。诚如布拉莫尔指出,省级领

导人的政治激进解释不了一个省内的县际之间差异,可县级领导人的政治激进能解释乡村之间的大饥荒差异吗?没有对乡村级的大饥荒差异有所了解,对县际和省际差异的解释也会不够完全。

四、大饥荒的微观成因与农民的生存

当宏观数据解读和计量模型不能很好解释,或忽视解释村里的事情时,对大饥荒成因和地区差异成因的研究无可避免要转移到村庄层面上来,或微观层面上来。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的几乎全是农村人口,他们的死因需要得到了解,他们不能总是只被当作数据算来算去。此外,他们的死因只有与其他农民存活的原因相比较时才能得到比较清楚的理解。不过微观的研究迄今仍很少。一方面,西方学者很难找到中国的村级档案,很难看到县级档案,很难靠文献来研究村庄的大饥荒;另一方面,村庄级的研究需要做口述资料,对西方学者来说,去中国农村做访谈一直比较困难。尽管难,还是有些学者做了一些研究。

早期对村庄级大饥荒有些系统记载的是一项以田野调查为主的对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家乡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的研究,由美国政治学家弗里曼(Edward Friedman)、历史学家毕克伟(Paul Pickowicz)和社会学家赛尔顿(Mark Selden)主持。这项研究显示五公有过饥荒:从1959年冬起五公的3个食堂都缺粮,煮了玉米秆吃,有12位老人过早死亡。饥荒的原因明显是1959年的过度征购:该年国家在五公的征购量超过以往最高征购量的一倍以上,以致村里没剩下什么粮食。不过五公研究的三位学者却没这么认为。他们指出,大饥荒及其死亡不是一项突然发生的错误政策的后果,而是一系列令人恐惧的制度化了的进程、价值观念和利益长期作用的结果。这些制度化的东西包括1947年土改时的恐怖、1957年反右运动的恐怖、“阶级斗争”思想等^①。三位学者赋予了五公的饥荒一种具有深层历史感的见解。但实际上,大饥荒时期只是他们研究五公历史变迁的一个部分。他们对五公的饥荒只了解了一个大概的过程,对其只有叙述却无分析,他们的历史感见解不能解释为什么五公有12位老人过早死亡而其他1850名村民未在饥荒中死去。

从微观角度首度进入大饥荒学术对话的是美国政治学家戴瑞福(Ralph Thaxton)。戴瑞福于2008年出版了一项对河南省被其化名为大佛(Da Fo)村的研究,展示了该村的饥荒从1959年冬持续到了1961年春,期间全村1470人中有100人死亡。戴瑞福认为粮产下降所导致的粮食短缺不

是饥荒的成因,因为大佛在1958和1959都是丰年,1960年的收成也很好;过度消费论和食堂制度论也不足以解释饥荒,因为大佛的食堂从1958年秋直到1959年夏都办得很好。戴瑞福的研究显示,从根本上来说是国家过度征购导致了大佛的粮食紧张。但从实际生活看,地方领导不让农民吃粮才是饥荒和死亡的原因:1958年秋大佛食堂的口粮定量是每人每天1斤,1959年夏成了5两,1960年春变成了2.5两,到了1960年夏食堂停办了,不再供应膳食。但大佛绝大多数人活了下来,90%以上是靠“吃青”生存,即吃田里未长成熟的小麦、玉米和高粱。戴瑞福指出,“吃青”减少了谷物的收成,造成国家农业税收的减少,因此它是农民的一种有效的“反抗国家的方式”,或者说大饥荒中农民的生存主要是靠日常行为中对国家的反抗^[31]。

戴瑞福对农民吃青的理论化是有问题的。戴瑞福了解吃青是历史上灾荒时的一种生存手段而非抗争手段,但认为它在大饥荒期间是抗争,理由是吃青无论是属于故意或非故意反抗国家都吃掉了一部分国家可以预期征购到的粮食,对国家利益造成了损害。但戴瑞福没有搞清楚大跃进期间粮食是怎样征购的。1955年开始国家的征购是建立在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上,产量和征购量是按三年一定固定下来的;在大跃进期间中共中央规定了征购量为产量的40%,还规定了“国家所必须掌握的粮食要首先保证”^②。换言之,如果一亩田收获了100斤粮,它在实践上分为两个部分:国家的40斤和农民的60斤,并且农民要先上缴国家的40斤。所以农民的吃青除非是吃掉了预期收成的40%以上才能开始损害到国家的利益,而大佛农民的吃青通常是吃掉了预期收成的1~2成^{[32]200-201},即吃掉了预期收成中本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这样的吃青谈不上是对国家的反抗。戴瑞福之所以强调反抗主要与他的书的主题有关。他研究的是政治反抗,把大饥荒的吃青视为共和国时期农民“按理反抗”(righteous resistance)的起源。

陈意新在2010年也发表了一篇从村庄级入手研究大饥荒的论文。陈调查了安徽皖北、皖中和皖南的3个村庄,认为饥荒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过度征购,但在饥荒中决定农民生与死的机制是村庄的宗族或血缘的领袖权。陈所调查的3个村庄中,皖北的村庄在被过度征购后缺粮,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全村360人中有61人死亡;大部分农民活了下来是靠吃青,并且与大佛一样,本村的干部默许了农民吃青并且干部家属还带头吃青。但陈意新的皖中村庄则不一样:在本村的几位干部被长期调去水利工地或其他工程后,上级

^①Edward Friedman, Paul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231-232, 240; *Revolutio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10.

^②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工作的指示(1960年5月15日)》。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88-392页。

派了外人进村担任了干部,结果外来干部与本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执行极端政策特别严厉,并在饥荒时派民兵阻止村民吃青或逃跑,派出民兵日夜守卫队部粮仓以防粮食被偷盗,最终全村198人中有101人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死亡,而活下来的人有一部分实际上是1960年后从水利工地、铁道工程、石料场等回到村庄的。陈意新调查的皖南村庄自然条件最好,但最重要的是该村干部们在上级派了外来干部后决定贿赂外来者,让其每个月背一袋米回到自己的家,以交换其对本村的瞒产和藏粮不闻不问,结果是该村的食堂在大饥荒期间一直有米吃,没有人饿死。在陈意新看来,3个村庄的经历显示,在血缘领袖权断裂的村庄里,农民在大饥荒中死得相对多些,反之相对少些。道理很简单,当一个村的人都是自己叔伯兄弟子侄时,村庄领袖会尽可能保护这些血缘的亲戚^[33]。

戴瑞福和陈意新认为从村庄角度看,过度征购是大饥荒的根本成因。有些村庄,像大佛没有粮产的下降,但在国家拿走了太多的粮食后,它们也遭受了饥饿和死亡。不过死亡也不是因为没有粮食那么简单,戴瑞福和陈意新一致显示了能否“吃青”是生存和死亡的关键。在吃青的几个里,食堂关闭,无粮食供应。这一时段,宏观讨论中的粮产下降、粮食短缺、城市偏好和食堂制度都不贴题。在戴瑞福看来,农民得以生存是因为他们有效地反抗了国家,但在陈意新看来,农民的生存主要是依靠血缘的群体和领导权实现自我保护。戴瑞福和陈意新的研究让学术界从村庄级的实际生活开始了解大饥荒的成因、农民生存的原因。但戴瑞福和陈意新的研究都有问题或局限。戴瑞福的农民反抗出自于对粮食征购复杂性的无知,而陈意新所观察的3个村庄都是单姓或单一血缘的村庄,其经验未必适用于解释非单一姓或多重血缘组织村庄。学术界还有待更多的微观研究来理解大饥荒。

五、大饥荒的其他议题

本文对西方学术界大饥荒研究的主要议题及其发展进行了回顾,讨论了学者们的观点及其形成的理由、关键论据、论证的主要思路和方法及其观点在学术对话中的地位。本文所涉及的议题除了非正常死亡人数外都是有关如何理解大饥荒的发生,很明显,大饥荒发生的原因还远没有研究透彻。

西方学术界的大饥荒研究当然不止于本文所

讨论的议题。贝克尔和冯客比较注重毛泽东的作用和披露事实,分别称大饥荒为“毛的秘密饥荒”和“毛的大饥荒”^{[1]xi-xii, [11]x-xii}。维也纳大学的汉学家文浩则跳出了中国的大饥荒,从国际性的视野把它与苏联1932—1933年的大饥荒作比较,与朝鲜1994—1998年饥荒并列,把它们界定为“社会主义饥荒”^[34]。学者们还对大饥荒的责任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文浩认为责任在中央,但在饥荒结束后中央把责任转嫁到了省级至乡村干部的身上,被处理和惩罚的全是这些人;高安东以信阳事件的结局为例,明显认为在责任问题上地方干部成了中央的替罪羊;布拉莫尔则认为地方干部在应对中央政策时有着主动性,所以他们也有很多责任,把责任归罪于毛泽东和中央,而实际上是地方干部为自己的推脱^①。美国历史学家贺萧(Gail Hershatter)和加拿大政治学家弋玫(Kimberley Manning)研究了大跃进和大饥荒对农村妇女各方面的影响,例如生产、家务、婚姻、生育、妇道、委屈^②。加拿大历史学家周杰荣(Jeremy Brown)利用了天津的档案研究了大饥荒中的天津,指出饥荒期间天津的城乡互动远比已知的要频繁,对减轻郊县的饥荒程度有作用^{[35]73-76}。大饥荒的各种回顾性资料则吸引了很多公共卫生专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因为对受荒期间出生的孩子进行研究可以看出他们是否比正常时期出生的孩子要矮,更易肥胖、更易患精神分裂症,是否在童年期间有学习障碍等。英国医生巴克尔曾在1992年提出“婴儿起源假说”,指出因营养不良生下来体积较小的婴儿容易患成人疾病。但这一假说极难证明,没有哪位怀孕的母亲会去为实验这一假说而饿到营养不良。但大饥荒期间出生的人口则为这一假说提供了巨大的样本,他们的人口普查资料、生育调查资料、学校成绩记录、医院的病历等都可以被专家们用来验证这一假说^③。

在过去30年里,对中国大饥荒的研究在西方吸引了好几个领域的学者,形成了一些有深度的中心议题和学术辩论。反观在大饥荒的发生地中国,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近几年来中国学者在利用档案资料方面已远超过西方学者,尤其是地方档案,但新出版的研究成果始终还未能如西方学术界那般形成有创意的对话体系。中国学者需要从对话中去开展自己的研究,中国官方也需要支

① Felix Wemheuer, “Dealing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the Great Leap Famin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1, 2010: 176—94; Anthony Garnaut, “The geography of the great leap famine”, *Modern China*, Vol. 40(3), 2014: 315—348; Chris Bramall, “Agency and famine in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1958—1962”,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8, 2010: 990—1008.

② 参见: Gail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Kimberley Manning, “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Woman-Worker: Rethinking Radicalism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Kimberley Manning and Felix Wemheuer, ed. *Eating Bitterness: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and famine*, Vancouver: UBC Press, 72—106.

③ 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例如: David St Clair, et al. “Rates of adult schizophrenia following prenatal exposure to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 *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Vol. 294, No. 5 (2005): 557—62; Z. Yang, et al. “Impact of famine during pregnancy and infancy on health in adulthood,” *Obesity Review*, Vol. 9, Suppl. 1 (2008): 95—99.

持对大饥荒的严肃研究,否则中国对这场饥荒的研究只能落后于西方,对这场饥荒的解释也只能任由西方学者评说。

参考文献:

- [1] Becker, J.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M]. New York: Henry Holt, 1996.
- [2] Ashton, B., Hill, K., Piazza, A., Zeitz, R. Famine in China, 1958—1961[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4, 10(4):613—645.
- [3] Coale, A. Population trends, population polic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in China[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4, 7(1):85—97.
- [4] Coale, A.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4.
- [5] Banister, J. An analysis of recent data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4, 10(2):241—271.
- [6] 中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1983[G]. 香港: 香港经济导报出版社, 1983.
- [7] Banister, J.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8] Peng, X. Z.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 provinces[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7, 13(4):639—670.
- [9] 曹树基. 大饥荒: 1959—1961 年的中国人口[M]. 香港: 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5.
- [10] 杨继绳. 墓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M]. 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8.
- [11] Dikotter, F.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M]. London: Bloomsbury, 2010.
- [12] Bernstein, T.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J]. *Theory and Society*, 1984, 3(3): 339—377.
- [13] Bachman, D.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4] Teiwes, F., Sun, W.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M]. Armonk: M. E. Sharpe, 1999.
- [15] Bernstein, T. Mao Zedong and the Famine of 1959—1960: a study of wilfulness[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6(186):421—445.
- [16] 逢先知, 金冲及. 毛泽东传(1949—1976)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 [17] Lin, J.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1959—1961[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6):1228—1252.
- [18] Yang, D. L.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6.
- [19] Chang, G., Wen, G. J. Commun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7, 46(1):1—34.
- [20] Lin, J., Yang, D. On the cause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and the great leap famine[J].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9(2):125—140.
- [21] Yang, D. L., Su, F. B. The politics of famine and reform in rural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9(2):141—155.
- [22] Chang, G., Wen, G. J. Food availability versus consumption efficiency: causes of the Chinese famine[J].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9(2): 156—165.
- [23] Lin, J., Yang, D. 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0, 110(460):136—158.
- [24] Kung, J., Lin, J. The causes of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 1959—1961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3, 52(1): 51—73.
- [25] Li, W., Yang, 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atomy of a central planning disaster[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13(4):840—877.
- [26] Yang, 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and famine of 1959—1961: a survey and comparison to soviet famines [J].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08, 50(1):1—29.
- [27] 侯永. 当代安徽简史[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1.
- [28] Chen, Y. X. Under the same Maoist sky: accounting for death rate discrepancies in Anhui and Jiangxi[C]// Manning, K., Wemheuer, F. *Eating Bitterness: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and Famine*. Vancouver: UBC Press, 2011:197—225.
- [29] Kung, J. Chen, S. The tragedy of the nomenkla-

- tura; career 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radicalism during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1,105(1):27—45.
- [30] Bramall, C. Agency and famine in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1958—1962[J]. *The China Quarterly*, 2011(208):990—1008.
- [31] Garnaut, A. The geography of the great leap famine[J]. *Modern China*, 2014,40(3):315—348.
- [32] Thaxton, R.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33] Chen, Y. X. When food became scarce: life and death in Chinese village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J].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2010,X(2):117—165.
- [34] Manning, K. , Wemheuer, F. Introduction[C]// *Eating Bitterness: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and Famine*. Vancouver: UBC Press, 2011:1—27.
- [35] Brown, J. *City Versus Countryside in Mao's China: Negotiating the Divid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责任编辑 潘亚莉)

The Study of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in the West

Chen Yix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UNC Wilmington, Wilmington 28403, USA)

Abstract: In their study of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scholars in the West have focused their efforts on several key topics and established a set of arguments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First, based upon various estimations made by demographers with the use of the data of China's censuses and fertility samplings, the Western scholarship ha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excessive deaths during the famine were about 27—30 million people. Second, through many years of debate over the main cause of the famine, social scientists have not only greatly advanced the study of the famine by the means of methodology, but also enabled the academic circle to realize that the famine resulted from multiple causes, including the decision-making mistakes at the political center, declin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cessive grain procurement, urban preference in food distribution, mandatory public canteens, etc. Third, scholars have investigated the discrepancies of excessive death rate across regions. While most agree that the political radicalism of a provincial leadership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influencing that province's mortality level, others point out that some other factors such as agricultural and ecological conditions played a role of no less importance. Last, a few scholars have examined the famine at villages in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micro mechanisms that often decided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peasants; and they perceive that traditional survival strategies such as "chi qing" ("eating green," or eating unripened crops) were significant to the survivorship of the peasants. The Western scholarship has looked into other issues of the famine, for exampl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amine, women's life during the famine, etc. Over the years the Western scholars have formed a creative dialog over the Great Leap famine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amine.

Key words: excessive death; excessive procurement; public canteen; regional variation; political radicalism; chi qing